

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民眾動員之路

——鄂豫皖蘇區史論析(1920-1932)

• 黃文治

摘要：鄂豫皖蘇區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在該革命場域，中共民眾動員大體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形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三階段民眾動員進程中，中共革命在克服與適應內在困境中發生着關鍵性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及革命手段之間的異化與畸變。革命的崇高理想即成為道德面子，並成為政治布局的服務藉口。當所謂革命崇高理想無法實現時，不擇手段即泛濫成災，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手段綁架理想」。本文從政治社會史維度重點對中共革命的動員進程、革命畸變及其革命正義道德的消解幾個層面進行解讀與剖析，探討中共革命的歷史社會基礎、內在困境及其衍生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鄂豫皖蘇區 動員進程 軍事全能主義 革命畸變 革命正義道德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及國共合作時期，未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①。國共合作破裂後，在蘇聯及共產國際主導下，中共中央才將蘇維埃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式接受下來，並把建立蘇維埃政權作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來抓^②。就「蘇維埃」一詞而言，它是俄文совет(英文為soviet)的漢語音譯外來詞，原為「代表會議」或「會議」的意思。隨着它的強力傳入，中國大地的多處角落在1920至30年代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蘇維埃革命，建立了頗多革命根據地(即「蘇區」)，比如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川黔蘇區、鄂豫陝蘇區、川陝蘇區、陝甘蘇區等。

* 本文為「安徽大學農村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點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項目名稱為「皖西革命及其鄉村社會變遷實證研究」(項目代碼：SK2013A015)；亦為「安徽大學博士科研啟動經費項目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項目名稱為「蘇維埃革命及其民眾動員之路」(項目代碼：33190110)。本文在寫作與修改過程中，曾與龔功秦、湯奇學、王邦虎、陸發春等老師有過深入交流、討論，在審稿過程中，亦得到匿名審稿老師多次包容性賜教，在此謹致謝忱。但本文論點如有誤謬，由筆者自負文責。

本文以鄂豫皖蘇區史為中心，重點闡釋蘇維埃革命中的民眾動員過程。鄂豫皖蘇區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其持續的時間段大概從1920年一直到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反圍剿不利、不得不遠走他鄉為止。其主導地域主要是大別山區，但演變極為頻繁，是先後由黃麻暴動、商南暴動、六霍暴動等烈火燎原而成的一塊根據地。在戰爭狀態下，其範圍大小變化不定。1931年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由河口遷入新集，定新集為省會，全區行政區劃共有二十餘縣，包括光山、羅山、商城、新縣、固始、六安、霍山、霍邱、金寨、英山、黃安、麻城、黃陂、羅田、孝感、黃岡、黃梅、廣濟、蘄春、蘄水等；蘇區四周各縣均為不完整地區，各縣城曾被紅軍佔領過，有七個縣全境為蘇區中心鞏固的根據地^③。

在這個蘇維埃革命場域裏，中共黨人領導、推行了一場通盤性的政治、社會革命。它是旨在促成整體性、暴力性社會變動的一場運動，革命對象包括權力體系、階級體系及話語體系。它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為指歸，以階級鬥爭暴力行為形式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國民黨鬥爭，以取得政權為最終目標，反映的是不可調和的暴力性階級顛覆活動。

那麼，這種特性的蘇維埃革命在鄂豫皖蘇區是怎樣被動員起來的？經歷了怎樣的動員過程？其間泛起了怎樣的動員困境？統合結果如何？

一 動員進程

以往中共官方視域內的黨史及地方革命史研究，一般都認為蘇維埃革命多半是因為軍閥、帝國主義在鄉村的基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對鄉村的盤剝及農民的絕對窮困所致，然後中共黨人一來到鄉村，通過宣教共產主義革命的理念及鬥爭方式，農民就會順其自然地匯入革命洪流。應該說，這種庸俗的經濟決定論的歷史敘事模式，一直以來都被固化為標準模式來教化後革命年代的芸芸眾生。現在比照真實的歷史來看，有些說法值得進一步推敲、審視。歷史的本相其實非常弔詭。

自辛亥革命已降，中國即進入由傳統的王朝體制逐步向民族國家體制過渡的大轉型時代。但是，這個大轉型時代依然未改變中國「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樣態，且帶來頗多劇烈的碎片化陣痛——列強強盜化、軍閥土匪化、土匪軍閥化、基層官員武劣化，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大極權雖已逐漸式微，而區域小極權卻在加強。這種碎片化的陣痛在鄉村加劇，既造成結構性的矛盾及仇恨，也帶來私怨性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矛盾及仇恨、貧富矛盾及仇恨，等等。這些矛盾及仇恨大小不一、形式多樣，並以各種方式散落在鄉村各個角落。與此同時，雖然科舉制度已被取消，但鄉村人們通過讀書來改善自身及家庭處境的心態卻未改變。因此，不少地富家庭的子弟被長輩送到更加開放的大中小城市去讀書。處在內憂外患危機氛圍中，這些人在讀書求學的過程中也變得易於接受新觀念，他們的國民身份意識及國族意識得到進一步啟蒙，道德激情與優越感得到進一步提升，而這種提升又促使他們總是在追求一種更為完滿的理想

在鄂豫皖蘇區，中共黨人領導、推行了一場通盤性的政治、社會革命。它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為指歸，以階級鬥爭暴力行為形式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國民黨鬥爭，以取得政權為最終目標，反映的是不可調和的暴力性階級顛覆活動。

社會。於是，處在青春期的他們普遍懷有某種浪漫主義心態，開始讀書不忘救國，並謀求現實社會的急切改良。

其中的頗多一些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從讀書不忘救國走向讀書不忘革命，開始接觸激進主義新組織與新思想，比如中共組織及共產主義觀念。他們最初踐行艱辛的城市運動，包括利用如師徒、同學、同鄉、同宗關係等傳統「社會資本」進行串黨、串團活動等。當然在這期間，他們也因各種因素，如放假、畢業、軍閥鎮壓及受中共上級委派等，開始回到鄉村推展鄉村農民運動。總體來說，在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運動之前，鄉村革命運動還是涓涓細流，但之後，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在城市已無存活的安全保障，於是大批轉入鄉村，在自己的家鄉進行鄉村革命運動。他們前期偏向聯絡地方精英，後期專注聯絡農民^④。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回鄉進行革命動員，因熟稔當地的人文社會生態，有着自身的地緣優勢。經過一番試錯、調整後，他們沒有過多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民運動政策，通過這些鄉村長久積澱的「日常行為軌制」，包括既存的「串親戚」、「交朋友」、「談天」、「唱山歌」等方式不斷深入鄉村。這些回鄉革命知識份子最為厲害的地方，就是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並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前文所言的散落在鄉村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這樣，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矛盾與仇恨，都被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的框架之內。一旦整合，鄉村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知識份子領導的鄉村鬥爭也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深刻含義。不過，鄉村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卻是由日常鬥爭引導而來的，包括借糧運動、減租減息運動及「五抗」運動（抗租、抗債、抗糧、抗捐、抗稅）等。最初，這些日常鬥爭很多以和平方式解決，但間中也難免擦槍走火，最後走向了群體性武裝鬥爭的境地。一旦進入此種境地，頗多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即開始逃跑，有的逃到大城市，有的逃到中小城市。因此，為了制止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逃跑，革命知識份子領導的農民協會就會進行清算運動，從鎮壓名副其實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開始，隨後即步入專橫與擴大化的狂歡。在清算的過程中，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在鄉村的威風被打壓下去，而農民在鎮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立威肉刑之中抒發、釋放了無以復加的仇恨感，同時也獲得實實在在的包括浮財在內的物質利益。但是，逃跑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亦不是等閒之輩，他們也會組織起來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復仇與反復仇。職是之故，鄉村階級界限及仇恨意識毫無疑問已在敵對階級血淚四濺之中夯實。如此，鄉村階級革命就難免不異化為鄉村地域性的械鬥。因此，這個時期的民眾動員更多是由情感驅動的，仇恨及憤怒是革命暴動的真正動力源泉，而平分土地並非革命緣起的充分條件。例如鄂豫皖蘇區最早暴動的鄂豫邊黃麻地區，此地農民在國共分裂前即有暴動，但是平分土地卻是1929年春之事。可見，土改並非革命暴動之充分條件。正因為是情感和仇恨的驅動，這個時期，暴動難免帶有半自發性特徵，同時也更多地兼具無序性。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

第二階段是土改的形塑。我們都知道，維持革命的績效需要一個穩定的後方提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支援，於是中共開始在暴動區域努力恢復秩序，

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矛盾與仇恨，都被回鄉革命知識份子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的框架之內。鄉村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知識份子領導的鄉村鬥爭也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深刻含義。

並建立一個非同尋常的蘇維埃政府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土改是這個時期民眾動員運作的標誌性事件。土改立竿見影地滿足了農民獲得土地的期望，因此農民都願意加入蘇維埃政府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而他們一旦加入中共的黨政軍群組織，同時又會帶來社會地位的升抬。因此，中共通過組織化動員，達到組織資源的一元化。筆者把這套組織資源一元化的體制稱為「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在這套體制裏，農民逐步黨國化，即使是大刀會等民間組織及其他農村婦女群體，中共也會通過各種途徑，將其納入革命陣營之中。農民一旦在物質利益及社會地位上升機會的激勵之下進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就會成為中共政治、經濟、話語壟斷的追隨者，中共及蘇維埃政權指向哪裏，那些底層農民就會將階級對立的怒火噴射到哪裏。但革命畢竟是大規模的暴力性集體行動，隨着國民黨圍剿的加劇，這種民眾動員的強度也會水漲船高，而一些因長期革命讓其失去既得利益的農民，就會對中共及蘇維埃政權產生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的表現，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共民眾動員就會以自己已經掌握的一套組織系統，以各種動員的技藝來達至革命的目標，這種情況愈是到蘇維埃革命後期愈是明顯^⑥。另外，中共對異類的懲罰也一直在警示着民眾，激情背後是無處不在的凝視與猜疑，不服從組織動員的目的，隨時就有被劃為富農成份的「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的危險。至於革命組織內被劃為富農成份的「反動份子」、「反革命份子」的異類，中共也會以肅反等方式來達到民眾再動員的目的。

第三階段是反富農的再動員。在「軍事全能主義」的蘇區封閉環境裏，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已在革命運動初期基本被掃光殆盡。在孔急的反圍剿戰爭狀態下，中共又必須動員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革命洪流來維持革命的績效。這樣，中共為繼續推進動員貧僱農革命，不得不確立另一種賤民成份——富農——作為革命組織的敵人，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利，甚至生命權，來適應民眾再動員的需要。至少在1929年底之前，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等鄉村舊惡勢力還是中共鄉村革命不共戴天的頭號仇敵，而富農還是中共革命的同路人，但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充分吸收了蘇俄的反富農經驗之後，隨着中共六大相關政策在鄂豫皖蘇區的傳播，反富農之風在當地風起雲湧。因此，在不忽略中共革命策略理論及其階級分析邏輯的主導作用下，也應充分注意中共民眾動員的現實需要及柔性層面。就鄂豫皖蘇區的民眾再動員而言，反富農又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李立三時期即開始反富農，但因地富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及富農的抵制，招致宣傳不到位，加上並未強力執行，因此並未起到民眾再動員的效果。但是，張國燾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完畢來到鄂豫皖蘇區之後，即面臨國民黨的迭次圍剿，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激情投入中共革命的洪流，反富農就成為必然選擇。

張國燾深諳蘇俄肅反經驗，並有自己的手段及獨到見解。他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投身革命，就採取民粹式群眾路線及肅反強力戰略，基本而言，其手段既有中國法家傳統及鄉村小傳統式的，也有馬列主義式的，不但達到加強一元化領導、控制鄂豫皖蘇區，使原先富農及富農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慘烈地被邊緣化，而且也達到了通過反富農來驅動民眾動員機器的目的，這在革命動員前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在沒有相關剎車機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說的是，這

張國燾深諳蘇俄肅反經驗，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投身革命，就採取民粹式群眾路線及肅反強力戰略，不但達到加強一元化領導、控制鄂豫皖蘇區，使原先富農及富農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慘烈地被邊緣化，而且也達到了通過反富農來動員民眾的目的。

種民眾動員最終陷入的只能是「過度動員」之泥潭而不可自拔，因此某種程度而言，也可見蘇維埃革命本身註定是不可持續的^⑥。

這樣，中共革命及其民眾動員大體有這樣的輪廓過程，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形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個過程是經過不斷試錯整合而成的，並不是一條先期預定、一帆風順的道路，這種道路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從城市轉入鄉村、從聯絡地方精英到專注民眾動員的實踐過程。當然在這樣的民眾動員實踐中，奪取政權及建立蘇維埃政府是其圍繞旋轉的真正軸心。

如此，革命因期望建立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起，但在革命理想及現實處境的調適與試錯之實踐過程中，奪取政權及權力的目標導向漸逐明確且變得首要，要想成功攫取這一首要目標，就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的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而這種提升過程，亦導致中共自身的革命理想持續消退而布爾什維克化原則逐漸增強，甚至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不管如何，這種試錯式民眾動員實踐，最終目標肯定是為建立中共特有的「軍事全能主義」體制，並進而通過政權及權力的有效攫取，來最終實現革命的理想圖景。

在革命踐行中，一旦政權及權力被看作是使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轉變為現實的主要手段，那麼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權及權力攫取成為首要目的。革命崇高理想在異化中畸變、走樣與變味，人在政權與權力嬗遞及運轉機制面前同樣也失去了自我的價值。

二 革命畸變

通過上文對動員進程的梳理來看，蘇維埃革命最初是由出身地富家庭的中共革命知識份子回鄉展開的。他們頗多都是道德絕對自信的革命者，在踐行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過程中逐漸明白，要實現這種圖景的主要手段就是奪取政權及權力，然後通過政權及權力創造新的理想社會。

不過，在革命踐行中，一旦政權及權力被看作是使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轉變為現實的主要手段，那麼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權及權力攫取成為首要目的，革命中的理想與目的之間的界限遂變得模糊不清——本是為了目的，而宣揚的卻是為了崇高理想，馬基雅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式的不擇手段亦不可避免。這樣，革命的崇高理想即成為道德面子，並成為政治布局的服務藉口。當所謂革命崇高理想無法實現時，不擇手段即泛濫成災，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手段綁架理想」^⑦，革命崇高理想在異化中畸變、走樣與變味，人在政權與權力嬗遞及運轉機制面前同樣也失去了自我的價值。

正因為如此，當時這些革命知識份子就如陳永發所言，「大概從來沒想過權力是否有腐化作用，作為道德和正義的化身，他們認為只要能真正有效地改造中國，個人的自由 (及尊嚴) 並不重要，暴力流血也在所不惜。」^⑧陳永發強調的正是正視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如不提防此點，就必然造成災難。比如鄂豫皖蘇區為了加強政治控制和以民眾再動員為目的的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不但殘害異類，且大面積反噬自身。

談及此，也使筆者聯想到秦暉談中國傳統社會行為模式——「儒表法裏」的特徵。所謂「儒表法裏」，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卻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卻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卻是「法、術、勢」；

紙上是「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卻是「權力中心主義」^⑩。五四時期把反極權與反儒家劃等號，中共革命更是把反極權與反文化傳統、反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等）等同起來，這種思路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反極權，應該更多關注、警惕的是法家傳統（如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等）的流延與泛用。筆者將中共革命反極權踐行的行為模式稱為「共表權裏」模式，即表面上說的是「共產主義理想」，內裏行的卻是「極權主義政治」；講的是「理想社會圖景」，玩的卻是「法、術、勢」。兩者看似前後相延而又有斷裂性。「儒表法裏」，「儒」和「法」本是兩套觀念制度，因此才有表裏之別。「儒表法裏」的「儒」並非僅僅只是儒家觀念，更是儒家的制度安排；「儒表法裏」的「表」也不僅僅是流於口頭的政治主張，它也是政治統治模式的一部分，只是這一部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共」本來就與「權」密不可分，中共革命中也沒有出現無「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共」。結合秦暉的意思，筆者倒是覺得可以把中共革命視為「儒表法裏」中「法裏」對「儒表」的拋棄。由於中共革命的衝擊，「儒表」已經喪失了合法性地位，無法再為「法裏」提供法理支援，那麼作為「裏」的「法」或「權」自然就依附於新的合法性基礎之上，即「表層化」的共產主義。

這裏還有更深入的問題。作為政權及權力運作規則的「裏」，與人們對權力本身的期待與要求是兩回事，由此才產生了「表裏」之別。如此，「表裏」之別的存在，在於人們無法正視政權及權力自身的運作規律。西式現代政治文明的建立，起點就來自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與道德、宗教等附加物剝離開，顯示出其赤裸裸的本性與邏輯。後來的各種政治建設，都是以此為基點的。西式的政治模式，就是在去掉政權及權力外圍的裝扮與修飾、權力直接露出本來面貌之後，按權力自身的邏輯來限制「惡」的發生。而中共革命則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一方面，它去掉了政權及權力外圍溫情的外衣，讓權力直接呈現於人們面前；另一方面，卻沒有去限制政權及權力的「惡」，反而是直接將政權及權力視為合法性，讓權力無限擴張與集中，形塑成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樣態。中共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政權及權力與革命是天然的同盟關係。這正如列寧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⑪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奪取政權及權力最好的外衣，所以，以共產主義為革命合法性，必然造成政權及權力的極度擴張、延伸與集中。在「儒表法裏」行為模式結束之後，中共革命其實是直接以「共產主義」來取代「儒表」的，但這裏的關係有所變異。在「儒表法裏」行為模式下，「儒」與「法」是對立的，即「儒表法裏」行為模式可以起到遏制「法」的過度膨脹的作用。但中共革命以「共產主義」取代「儒表」之後，由於革命與政權及權力本身就是同盟關係，相互支持，於是就造成了內裏的「法」（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

因此，中共革命踐行「共表權裏」行為模式，其中「表裏」的高度一致性及同盟關係，最終形塑為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體制。在這種體制裏，政權及權力得到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在沒有相關機制制衡的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奇異的情況：作為整體的政權及權力，其本身力量愈來愈龐大，「擴張」與「延伸」到無孔不入的地步；與此同時，「集中」也在隨時隨地強力發生。其間的彈性、

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奪取政權及權力最好的外衣。在「儒表法裏」行為模式結束之後，中共革命以「共產主義」取代「儒表」，由於革命與政權及權力本身就是同盟關係，相互支持，於是就造成了內裏的「法」（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

分化與張力因素，必然致使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隨之無限擴張與延伸。早期道德絕對自信及理想化的知識份子型中共黨人在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中之所以慘烈地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諳馬列主義組織原則、中國法家傳統及鄉村小傳統的中共黨人(如張國燾為首的新型領導)，本身就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

進行革命史研究，一定要注意此點，如果不承認這種現實，「用絕對的正確或錯誤來定義某一個決定，那麼就會受一種殘酷的宿命論支配，以至無法對歷史的經驗做出有益的反省；除了印證乾巴巴的教條外，歷史的豐富意義之源也會關閉。」^①革命史是歷史研究的富礦帶，在輕輕撫慰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應該本着多元統合的原則，從歷史經驗中孕育、吸取理性常識的教益。

三 革命正義道德之消解

那麼，傳統國家歷史書寫模式能否從歷史經驗中孕育、吸取理性常識的教益呢？答案恐怕並非如此肯定。

自1950年代以降，中國官方的歷史書寫，尤其是革命史的書寫，嚴重地被納入國家化軌道，這種意識形態書寫及配套教育方式，總是在為政權的合法性進行一以貫之的論證；在後革命時代又經革命勝利者不斷裝扮、形塑，日久彌新為單一話語結構及體系，其革命正義道德在國人心目中，就會享有至高無上、至愛無雙的崇高地位，鋪天蓋地都是革命的正當性宣傳。任何人似乎只要扯上革命的大旗，就佔據了道德召喚的至高點。一旦這種劇場效應形成，就會帶來「左」的路徑依賴及相關負面遺患。

中國自1978年後，即進入大轉型時代。在這個時代，隨着中共革命事件的過去及意識形態魔力的消散，組織系統內骨幹份子與民眾分離、游移都無可避免地愈發突出，並導致組織體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銷蝕。這樣，中國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如歷史劇場中一樣，總在重複、激化，並造成民間暴力事件不斷生成與蔓延，中國好像又在漸逐陷入一個一以貫之的革命正義道德機制輪迴的漩渦之中。

如此，要真正把脈革命正義道德消解問題，就需知曉中共革命緣起及動員進程的內在理路。其中的內在理路其實很簡單：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模式下，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尤其是前者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仇恨，於是革命的根苗存在並萌芽。當革命的根苗與革命的火種相遇，革命的烽火就會點燃。中共革命的火種，即早年深受激進主義思潮洗禮的革命知識份子。他們下鄉動員懷有怨恨情緒的農民匯入革命洪流，切中的要害即上文提到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仇恨，而將其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中，並在鄉村踐行打倒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暴動，當時極為深入人心。之後，隨着敵對國家力量的強力進入，鄉村社會即從群體性暴動走向革命。革命過程中，中共的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得到不斷提升，傳統鄉村社會結構即被打破，建立起來的卻是「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建國後，這種「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又直接過渡為「全能式極權主義」體制。

中國自1978年後，即進入大轉型時代。隨着中共革命事件的過去及意識形態魔力的消散，導致組織體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銷蝕。這樣，中國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總在重複、激化，並造成民間暴力事件不斷生成與蔓延。

赫爾岑 (Aleksandr Herzen) 曾說：「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進。」^②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尋求歷史真相，但最終目的是為探索未來走向。因此，現今中國當政精英及組織應該從先輩革命的經驗及教訓中吸取深刻教益。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餘年，但這種「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模式形塑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不僅未被根除，甚至有加劇的趨勢，這是中國激進主義生成與泛濫的根源，如果繼續放任不管，導致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的進一步激化，所引起的怨恨累積恐怕無法消解甚至會突破臨界點。一旦突破臨界點，底層人們將再一次爆發反體制的叛亂或革命，其破壞性及殘忍性將是無以復加的，而且這一歷史的周期也不會比前一段時間短。此外，要與這樣一種後極權主義政權進行抗爭（妥協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進行民粹式的死命抗爭，而抗爭的結果，要麼失敗，要麼成功。如果想成功的話，作為反抗的主體必須是一個更有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的實體，不然毫無成功之希望。在激烈抗爭的過程中，即使經受了浪漫、亢奮甚至鮮血沸騰的殘酷之後最終走向了成功及勝利，但人們之後也會突然發現，舊的習慣及行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在廢墟上重建的也只是更加極權的國度，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關乎此點，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就說，革命最初追求的也是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理念，但革命後的社會只會更加極權，這或許還是歷史傳統的延續，因為革命本身是國家極權的結果，但極其弔詭的是，革命及後革命年代則又加劇了極權的程度^③。梁啟超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說「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④。通過他們兩人的表述可見，激進主義是極權主義的變種，激進主義是暴力革命的嚮導，但是，以激進主義反對極權主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會陷入激進與極權的輪迴。這樣，歷史穿越彎曲的時空隧道，給後人帶來頗多經驗教訓：既然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不能隨意鼓譟，那麼就突顯出自覺理性的改良比暴力儀式性的革命更重要。

按照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闡釋，社會轉型本身不會產生革命及大規模社會運動，只有當一個社會的變化不能及時調節或者說制度化時，社會變遷才會成為大規模集體行動甚至革命的溫牀^⑤。很明顯，亨廷頓所言的「及時調節或者制度化」屬於自覺理性改良的範疇。那麼這種自覺理性的改良又是怎樣的一種導向呢？可以斷定，中國式全贏全輸的零和革命方式換不來社會進步，它必須對革命歷史中形塑的「共表權裏」行為模式進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礎上促成當政精英及組織對民權的逐漸讓步來實現中國的轉型與進步。當然，這只是一種社會改良導向，筆者認為相互妥協、溫和穩健的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爭是進行自覺理性的改良、調適及消解革命正義道德機制輪迴的關鍵因素，並且這種制衡性制度及抗爭性制度，其制度內涵、形式及技術是內生及外嵌相融合而生成的，不是完全移植於西方，但可兼容並蓄地向西方學習、借鑒。

歷史在不斷變動中，已無數次地翻頁、翻頁、再翻頁，其累積與疊加已使後人無法輕易轉身、走開。當我們回首凝視自己身後的影子及走過的道路時，歷史已經賦予我們真切的使命：一方面，我們必須努力廓清那些官方話語中漂

激進主義是極權主義的變種，激進主義是暴力革命的嚮導，但是，以激進主義反對極權主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會陷入激進與極權的輪迴。既然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不能隨意鼓譟，那麼自覺理性的改良就比暴力儀式性的革命更重要。

染與塗抹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仔細聆聽、閱讀，並不斷地重新思考、檢討歷史，哪怕最後所剩的只是幾頁、幾行帶有淚水的有價值痕迹，呈現給這個新世紀的平庸年代，但我們不要小看這種呈現，它可以溢出常識，幫助凡人通過瑣碎的日常行為來理解理性共識的啟蒙。值得思考的是，在這個平庸年代，中國會走出那個曾經的「革命困境」麼？會避免真正的「後革命困境」麼？中國通向未來之夢的未來路徑還會是一種依賴路徑麼？

註釋

- ① 中共建立之初，恥於「爭權奪利」，只主張「社會革命」。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時期，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因此這個時期，中共一般從事的是幫助國民黨搶奪地方政權及整合地方精英，奪權並非明目張膽。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才真正在鄉村掀起奪取政權及建立蘇維埃政府的鬥爭。參見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頁128。
- ② 張興亮：〈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中的「蘇維埃」：話語演變及其反思〉，《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頁110-16。
- ③ 參見〈鄂豫皖蘇區郵電史資料〉，湖北省檔案館，SZ104-02-0332-001；曲琦：〈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擴大的總形勢〉，載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翻印：《中國蘇維埃》(北京：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頁47-51；〈鄂豫皖蘇區發展的簡略概況〉，麻城市黨史辦，A3-05-13，頁1。
- ④ 黃文治：〈革命播火：知識份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開放時代》，2011年第12期，頁5-26。
- ⑤ 參見黃文治：〈山區「造暴」：共產黨、農民及地方性動員實踐——以大別山區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3-1932)〉，《開放時代》，2012年第8期，頁5-31；〈從叛亂走向革命：保土意識、階級意識及鄉村革命動員——以中共與皖西大刀會為中心的探討(1922-1932)〉，《學術界》(合肥)，2010年第10期，頁186-200；〈革命動員、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未刊稿。
- ⑥ 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頁36-59。
- ⑦ 李新的《李新回憶錄》未刊稿有「手段綁架理想」一說，但刊印本《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刪除了此語。
- ⑧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79。
- ⑨ 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183。
- ⑩ 列寧(Vladimir I. Lenin)：〈論兩個政權〉，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19。
- ⑪ 胡傳勝：〈「五四」事件中暴力行為再反思〉，《開放時代》，2010年第8期，頁54。
- ⑫ 參見梅德韋杰夫(Roy A. Medvedev)著，何宏江等譯：《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扉頁。
- ⑬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280-317。
- ⑭ 梁啟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載沈鵬等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九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2612。
- ⑮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李盛平等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頁260。

黃文治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講師，歷史博士。